

《反杜林论》哲学编解说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教研室

校 内 用 书

*

197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06,000 册数：1,700
统一书号：1011·79
定价：0.84元

说 明

这本《〈反杜林论〉解说》，曾以《〈反杜林论〉讲稿》为名，作为我系内部教材，于1973年油印过一次，又于1976年12月铅印过一次。这次出版，考虑到今后教材应保持相对稳定，作了较大的修改。由于水平有限，不妥之处难免，热切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指正。

本书初稿，除第四章至第八章由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有关同志执笔外，其他各章均由哲学教研室的一些同志分头执笔。全部初稿的统一修改以及其他总其成的工作也是由哲学教研室的几个同志负责的。

1979年6月

目 录

《三版序言》解说	1
《引论》解说	38
《一 概论》解说	39
《二 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解说	75
《第一编 哲学》解说	77
《三 分类。先验主义》解说	77
《四 世界模式论》解说	93
《五 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解说	107
《六 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解说	129
《七 自然哲学。有机界》解说	145
《八 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解说	163
《九 道德和法。永恒真理》解说	178
《十 道德和法。平等》解说	201
《十一 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解说	221
《十二 辩证法。量和质》解说	237
《十三 辩证法。否定的否定》解说	262
《十四 结论》解说	279

《三版序言》解说

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光辉著作《反杜林论》，写于一八七六年五月至一八七八年七月，先以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前进报》上，一八七八年七月汇编为单行本出版。恩格斯在这本著作里，在同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杜林进行论战的同时，经典地、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列宁指出：《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列宁选集》第1卷第92页），它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同上，第2卷第442页）。

恩格斯在一八七八、一八八五、一八九四年分别为《反杜林论》写下了三篇序言。这三篇序言，不仅说明了《反杜林论》一书写作的背景、目的、修订情况，而且阐述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因此，学习《反杜林论》，就不能不首先学习三版序言。

三版序言中，一、二版序言是重点，三版序言可以和二版序言一起学习。

一

在一版序言中，恩格斯结合当时德国党内斗争的情况，讲了四个问题，着重说明了《反杜林论》一书写作的原因和写得

这样详尽的理由。

(一) 为什么要写《反杜林论》(第1—2段)

关于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这场严重斗争的性质,当时在德国党内,有两种错误的看法。一种是杜林派的故意歪曲,胡说恩格斯之所以批判杜林,是因为杜林触犯了马克思,因而使恩格斯感到“愤怒”。他们纷纷指责恩格斯“态度激烈”、“不肯容忍”、“用非同志式的态度进行辩论”等等。最主要的杜林分子莫斯特还污蔑恩格斯“冷酷”。当时的杜林分子、后来的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甚至说:马克思和杜林的理论分歧是不重要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总之,杜林分子把恩格斯对杜林的斗争歪曲为一场无原则的意气之争,把《反杜林论》的写作说成是恩格斯主观情绪支配的结果。另一种是一些老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也不理解理论斗争和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的关系,如倍倍尔就把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看成是“纯粹学术性争论”。

为了揭穿杜林派的歪曲,同时也为了提高一些思想糊涂的同志的认识,恩格斯首先尖锐地指出:“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激动’的成果。恰恰相反。”^①就是说,这场斗争的性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究竟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还是用杜林的机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原则问题,是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还是要杜林的假社会主义的原则问题。这是两条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非进行到底不可。《反杜林论》正是这场路线斗争的成果,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客观需要的产物。

① 所引恩格斯的话,凡不注明出处的,均在被解说的章节。

为了进一步说明反对杜林的这场斗争的性质，恩格斯接着概括地指明了杜林进攻的背景。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三年前”，即1875年这个时间。

从国际上看，1875年，世界历史已经处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的第二时期（1872—1904年）。这个时期的特点，正如列宁指出的：“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这样的形势，是机会主义滋生、泛滥的客观条件。列宁指出：“十九世纪末叶的客观条件格外助长了机会主义，使利用资产阶级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官僚和贵族阶层，把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同上，第678页）。杜林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同路人，把自己打扮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实际改革家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他的进攻才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

特别是从德国党内的状况来看，187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当年五月的哥达大会上实行了合并。这个合并有很大的缺点。爱森纳赫派的领袖们为了急于建立统一的政党，不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以至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派作了不可容忍的让步，犯了严重错误。因此，这个统一是在跟机会主义进行妥协、调和的基础上实现的。所通过的《哥达纲领》是一个充满拉萨尔观点的机会主义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则上不反对合并，但坚决反对在机会主义基础上的合并，坚决反对“拿原则做交易”。为此，马克思对《哥达纲领》作了严厉的批判，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这篇光辉的文献（当时没有发表）。这个合并表明

党内许多人，特别是领导人，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学习是很不够的，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了解是很差的。合并的消极后果，就是党内思想水平进一步下降，机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泛滥，不仅拉萨尔主义扩大了影响，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乘势混入。杜林正是利用这个弱点，大吹大擂，欺世盗名，把自己打扮成党的理论大权威，抛出一整套著作，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到社会主义理论，从理论到实践，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全面进攻。杜林的机会主义不仅没有在党内得到应有的反击，相反却通过杜林派在工人运动内部广泛传播开来了。它已经成为党的主要危险。恩格斯写《反杜林论》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粉碎这个主要危险。

下面，恩格斯就从三个方面分别说明了为什么要写《反杜林论》，也就是具体说明了杜林的进攻为什么成为党的主要危险。这三点也就是“决不是‘内心激动’的成果”的展开和具体化。

(1)为了维护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必须反击杜林。恩格斯引用“我在德国的友人”即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意见，指出：“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刚刚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是完全必要的。”

恩格斯的话说明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对于一个党来说，根本指导思想的分歧，是产生组织分裂的原因。杜林在理论上的进攻，正是为了否定党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花了几十年时间和心血才在德国党内树立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恢复已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清除了的五光十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理论上搞大倒退。马克思指出：在科学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

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8页）杜林就是这样一个根本反动的假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他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了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践计划”（第322页^①），严重地威胁着党的团结和统一。所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纯洁性，彻底揭露杜林的假社会主义及其哲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对于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是绝对必要的。

（2）为了肃清杜林的恶劣影响，使那些受蒙蔽的同志清醒过来，也必须反击杜林。恩格斯说：“此外，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诚欢迎，……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好意，才不加考察地也相信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准备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个学说。”

恩格斯用很概括的话说明了当时杜林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杜林派的活动。伯恩施坦在他的自传中承认：当他看到杜林的两本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和《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后，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已经不能满足运动目前所达到的水平。他说：“我受到杜林著作的鼓舞，把它介绍给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反映几乎都同我一样。”正是他在1873年把杜林的书籍送给当时尚在狱中的倍倍尔、莫斯特看，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同

^① 凡只注明页码的引文，均见《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单行本。

意。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倍倍尔果然上了当。莫斯特在看到杜林的著作后表示同意说：“如果有最好的东西，我们当然要用最好的东西。”因此，很明显，这些杜林分子就是要用杜林的机会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

杜林分子还千方百计地扩大杜林的影响。两党合并后，恩斯这个狂热的杜林分子，在1875年10月写了一篇颂扬杜林的文章，他说：“我们在科学领域内最热心、最果敢、最勤奋的领袖，柏林的欧·杜林博士先生，在一年内已经发表了三部划时代的巨著。”他吹捧杜林的《哲学教程》“这部著作具有突出的明晰性和尖锐性，我们是不能设想更全面和更激进的了。”莫斯特也在1876年5月写了一篇颂扬杜林的文章，要求《人民国家报》发表。甚至在《反杜林论》一书已经发表了第五章以后，恩斯仍于1877年2月写了一篇文章，颂扬杜林，指责恩格斯。这篇文章遭到《柏林自由报》拒绝后，恩斯将它扩大为两篇用小册子发表。杜林分子就是这样想方设法在工人中散布杜林的学说。

第二，更严重的是当时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等也一度被杜林欺骗，看不到杜林的谬论及其宗派集团对党的危害。倍倍尔在看到伯恩施坦送去的杜林的著作后，在1874年初写了两篇颂扬杜林的文章。题名为《一个新的共产主义者》，匿名发表在同年3月20日的党的机关刊物《人民国家报》上。倍倍尔在结束语中说：杜林著作的“这些基本观点是卓越的，是得到我们充分赞同的，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宣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杜林的最新著作属于最近时期经济学领域中最佳著作之列……。”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向该报编辑李卜克内西提出了抗议。可是，李卜克内西同样不认识杜林的反动本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抗议很不理解。他在1874年6月13日写给

恩格斯的信中针对上述抗议质问说：“您有什么根据认为（杜林）这个人是一个无赖之徒或隐蔽的敌人呢？根据我对他的接触，我深信他虽然有些糊涂，但完全是诚实的，而且坚决地站在我们一边。”同时，他又为倍倍尔的颂扬文章辩护说：“您所责难的那篇文章并不完全正确，而且过分热情，但其用意无疑是好的，影响也不坏。”因此，李卜克内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抗议后，直到1875年3月2日还在《人民国家报》上转载了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关于巴黎公社的那一段。这些就是书上所说杜林受到党的刊物热诚欢迎的一些具体情况。

只是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教育和帮助，李卜克内西才逐渐认识到杜林及其宗派集团的危害，于1875年4月21日、11月1日，特别是1876年5月16日再三邀请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批判杜林。但以后，他又受到杜林派的影响，在刊登恩格斯的文章时，向他们作了让步，如把恩格斯的文章登在次要版面上，在没有人阅读的选举期大登特登，在选举期后反而不登，断断续续，以至恩格斯为此向他提出严重抗议。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白拉克，也对杜林认识不清。他在1876年8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毫不怀疑，杜林对他自己的观点作了十分重大的修改，改得使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同志。”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些领导人都错误地相信了杜林的好意，不加考察地也相信了他的学说，上了当，受了骗。

第三，党的领导人如此，一般党员群众也是如此。杜林的思想特别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党员中博得了更多的喝采。甚至在《反杜林论》的“哲学编”已经在《前进报》上登完，还有一个南德意志的学生写了一首颂诗，把什么“思想家”、“导师”、“大智者”、“敢作敢为”等等桂冠一起加到杜林的头

上，对他的盲目吹捧简直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这样的东西，李卜克内西竟然又把它登在1877年7月6日的党中央机关刊物《前进报》上！

所有这三个方面都说明，杜林和杜林派的影响异乎寻常，他们不仅蒙蔽了一般党员，也蒙蔽了党的领导人，无怪乎倍倍尔在回忆录中说：“杜林做到了使柏林运动领导人几乎全体都赞成他的学说。”白拉克也说：“柏林人全部都是杜林的热烈的支持者。”这充分表明，当时德国党内，特别是领导人，没有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缺乏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能力，分辨不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形而上学。正如恩格斯在1877年7月31日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的：“党在精神和理智上的衰退是从合并时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64页）。为了纠正这种危险的情况，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反击杜林是很必要的。

（3）杜林一伙的进攻是十分猖狂的，为了揭露他们一伙的阴谋诡计和野心，也必须反击杜林。恩格斯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利用了一切广告和阴谋的手段，迫使《人民国家报》对于抱着这样巨大野心的新学说采取明确的态度。”

杜林决不是搞“纯学术”的人，他是有明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他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是为他搞假社会主义和组织上分裂党作准备的。他野心勃勃地在党内建立了一个宗派小集团，其成员有莫斯特、伯恩施坦、弗里切、恩斯等人，妄图以这些人为核心，另立中央。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杜林“公开地着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一个未来的单独的政党的核心”（第322页）。这些人虽然是一小撮，但是危害极大。

杜林及其追随者搞阴谋诡计，集中表现在想把党中央机关

报变成杜林分子的讲坛上。杜林抱怨《人民国家报》“噤若寒蝉”，即认为中央机关报对他的谬论开放得还不够。杜林一声令下，他的追随者恩斯、莫斯特就写颂扬文章，要求登在《人民国家报》上为杜林作广告。当这个阴谋没有得逞，莫斯特就向李卜克内西抗议不发表他赞美杜林的文章。他们还在1876年于哥达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进行夺权活动。由杜林的另一个狂热追随者弗里切出面，攻击李卜克内西“实行专制”，说什么“莫斯特关于杜林的一篇文章被《人民国家报》退还了，仅仅因为杜林写过文章反对过马克思”，作为这种“专制”的证明。李卜克内西当场驳斥了弗里切的指控，同时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亲自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总之，杜林搞机会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产生了巨大的恶劣影响，成为刚刚获得统一的党的主要危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接受了李卜克内西的再三邀请，于1876年5月下决心反击杜林，认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第322页）。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针对杜林和杜林派莫斯特等人的猖狂活动，写信给马克思说：

“试问，难道不是认真考虑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的时候了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4页）马克思立即在5月25日回信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同上，第15页）。就在马克思的支持和参加下，恩格斯毅然放下了从事数年之久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在5月28日就拟订好了反击杜林的计划，他写道：“我已经订好了计划。开始时我将纯客观地、似乎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和庸俗的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这样一来，莫斯特及其同伙就失去了说什么‘冷

酷’等等的借口，而杜林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同上，第19页）就这样，恩格斯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给予以杜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思潮以迎头痛击，写下了《反杜林论》这部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朽巨著。

《反杜林论》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呢？

首先，它彻底粉碎了猖獗一时的杜林及其宗派小集团。杜林在《反杜林论》最初几章发表以后曾想反扑，但实际上他在遭到恩格斯的毁灭性打击后已无力反扑。只好象1877年7月21日李卜克内西给恩格斯的信中所记载的那样狂叫：“我是一种力量”，“谁不同意我，谁就是反对我”，“我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谁不相信我，谁就是叛徒”。这些叫嚷不过是疯狂的挣扎。正如列宁后来评论的：在七十年代末期，实证主义者杜林暂时显露过头角，但马克思主义很快战胜了他的机会主义（参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而杜林的宗派小集团，也很快解体了。列宁还指出：“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杜林的拥护者们（其中最突出的是莫斯特）很快就滚到无政府主义立场上去”（《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4页）。莫斯特后来在1880年的维登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

其次，它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逐渐认识了杜林机会主义的真面目，坚定地走上了反对机会主义的道路。列宁指出：“一切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者（当然，他们的首领是倍倍尔）很快就认识到各种‘新’理论的全部腐朽性，并与这些理论和一切无政府主义的企图一刀两断。”（《列宁全集》第19卷第294页）。

第三，它也教育了德国的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反杜林论》才发表到第五章，就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党

员写信给恩格斯说：“这个作品太好了”，要求“更广泛地得到传播”；还说：“这个新年（指1877年初，因《反杜林论》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该年1月3日）不能以更好的和更切实的东西来开始了”。

由此可见，《反杜林论》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使刚刚统一起来的党沿着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前进。

（二）《反杜林论》为什么要写得 这么详尽（第3—5段）

恩格斯在第三、四、五段分别说明了三点理由。

（1）《反杜林论》之所以写得详尽，是由批判对象的性质，即杜林的体系决定的。杜林的体系是什么货色呢？

1.杜林体系的核心是假社会主义。它以抽象的正义、平等、人性为基础；它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它的一个特点是有一些貌似革命、实则是为反动派效劳的主张。对于杜林的社会主义，恩格斯作了一个结论：“无论我们向什么地方看，总是看到特殊普鲁士的社会主义”（第313页），即一种改良主义的假社会主义，普鲁士式的真资本主义。

2.杜林体系的哲学基础是折衷主义哲学。杜林的社会主义是有一套哲学论证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杜林标榜自己是当代哲学的代表，把自己的哲学吹嘘为“现实哲学”。实际上，他的哲学是折衷主义的杂拌汤，其中有康德的先验主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以

及庸俗的唯物论，还有孔德的实证论，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拼凑起来的。他以一个“不够坚定、明确、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列宁选集》第2卷第248页）的面貌出现，但是常常滑到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甚至求助于上帝。恩格斯直截了当地称杜林为“愚蠢的形而上学者”（第133页）。总之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

3. 杜林体系的经济学基础是庸俗经济学。杜林只反对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而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他认为暴力是“一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最后说明”（第252页）；他抹煞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的本质差别，把暴力说成是绝对的坏事，反对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在经济学的著作中同样大骂马克思，而实际上，凡是他所说的稍为合理一点的东西，都不过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剽窃和庸俗化。

由此可见，恩格斯和杜林的论战，确实是一场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恩格斯要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杜林则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维护资本主义；恩格斯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坚持辩证法，而杜林则挂着唯物主义的招牌贩卖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恩格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杜林则打着人性、正义、平等的旗号，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很显然，如果让杜林的这条路线在党内得逞，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改变了党的性质，葬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恩格斯形象地把杜林的体系比作一个“酸果”。“它不仅是很酸的”，就是说反动透顶；“而且也是很大的”，即又空又长。尽管杜林本人是微不足道的，他的体系也没有什么科学内容，但是他提出的这些问题却具有普遍性和极大的欺骗性。

为了彻底揭穿这个体系的反动性，就“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正如恩格斯后来又一次指出的，“不得不涉及所有的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制，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第323页）。所以，写得详尽是很自然的。一版序言所说“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采取同这一对象的科学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科学内容极不相称的详尽程度”，就是这个意思。

（2）《反杜林论》之所以写得详尽，更重要的是为了正面发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

恩格斯不是消极地批判杜林，而是在批判过程中，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地从正面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在联系。《反杜林论》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它在彻底粉碎杜林的反动思想体系的同时，第一次光辉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系统地论证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哲学、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可分割的完整学说。恩格斯在战斗中把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把“破”和“立”辩证结合起来的光辉典范，为无产阶级反对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锐利武器，它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一起，为党创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早在1920年建党活动初期，就把《反杜林论》的三章，也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为当时“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必读著作。在反对林彪集团的斗争中，党中央又一次把《反杜林论》列为每个干部必读的马列基本著作之一。我们在学习中，必须紧紧掌握《反杜林论》正面发挥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特点，在这上面下功夫。